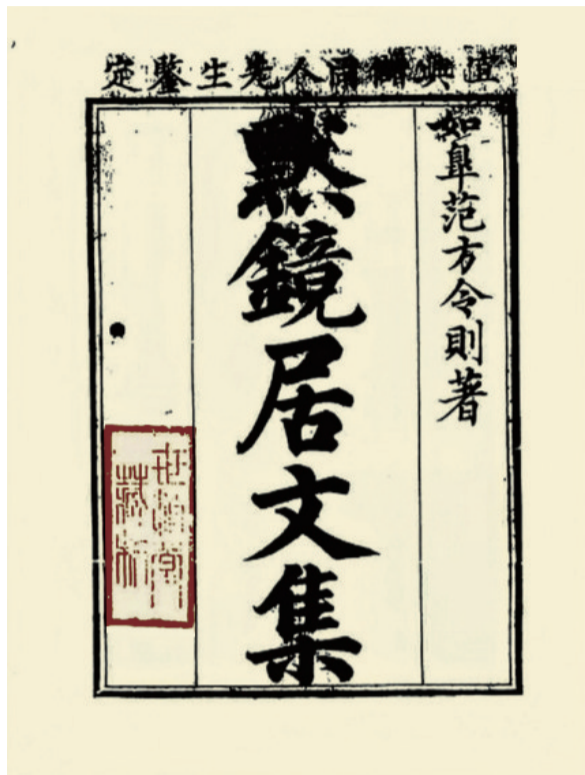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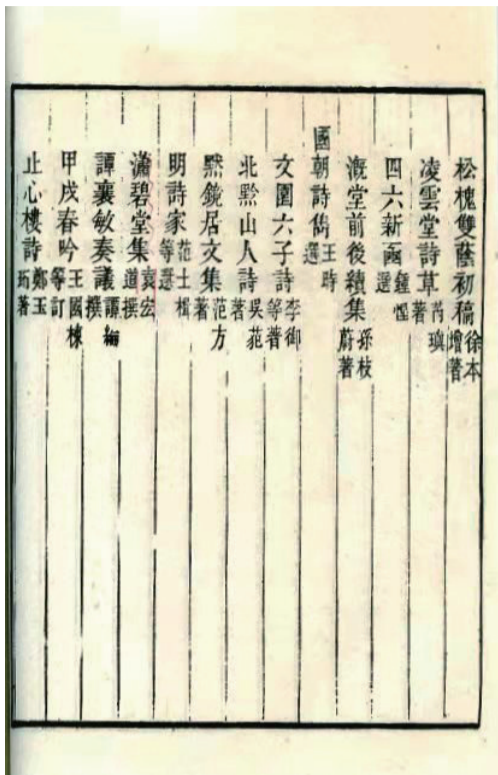
海陵旧话

一本逃过熊熊烈火的禁书(上)

□徐继康



《默镜居文集》书影



《禁毁书目》书页

这本书叫《默镜居文集》。

乾隆四十九年(1784)正月初四,朝廷批准了新一批禁书书目,如皋范方的《默镜居文集》名列其中。

此书刻印于乾隆二十六年(1761)。那一年,作者范方已经去世将近六十年了。他是谁,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在嘉庆《如皋县志》卷十六中,收有他的小传:

范方,字令则,文正裔孙,号葆朴子。少遵父崇式家教,端言矩步,以明伦敬身为实学。长益肆力古文,粹然渊深,专宗韩柳。著《默镜居文集》二册,山阴赵锦园、三韩周振庵两邑侯为梓以行世。又著《诗经闻疑》二十二卷、《诗经汇话》二十四卷,同时韩慕庐、陈椒峰、黄仙裳、张良御诸先生金云“堪为六经羽翼”。直性情淡泊寡营,对之如饮醇醪,年逾八旬。子安愚、安素俱康熙,兼优文行,安素子昶由明经授翰林院待诏。

明天启二年(1622)十月十九日,他生于如皋的一个书香世家,祖父范希曾做过广西全茗州的别驾,但父亲范崇式却以布衣终生。十二岁时,母亲吴氏就去世了。他的青年时代,正逢明清革鼎之际,为了躲避兵燹之乱,父亲带着他寓居掘港场十年,先是跟随舅舅(继母的兄弟)罗时升(字允吉)读书,后又入何应试(字君庸)门下攻举子业。二十七岁时被苏松学政苏銓取为秀才,此后功名就没有再进一步,老困诸生。受当时皋东文士王宣怀、顾匡宇等人的影响,其一生酷爱经史,一辈子除了娶比自己小四岁的冒氏(冒起京之女,是冒辟疆未出五服的堂妹)为妻,生了五个儿子之外,好像没做什么正经的事,生计更是不问,只是一门心思地解经论史、埋头著述。

康熙十年(1671),崇川陈世景曾经去过一次范方的家,只见“牙签玉轴,堆积几案,先生则口哦手批,曾不少辍”。过了二十年,陈世景又一次拜访,看到的情景与二十年前无异,“牙签玉轴犹是也,口哦手批犹是也”,年过古稀的范方庞眉皓首,古貌古心,望之如羲皇上人,不由大呼此老为“纯儒”。

康熙六年的进士陈玉璠以苦学著称,所为诗文,旬日之间,动至盈尺。但说到这位范夫子,也是“久企鸿名”,他在写给朋友周白公的信中,暗许范方是“今日海内真能读书真作古文之人”。

范方的确写了许多书,有一份《默镜居书目》,记录了他的所著之书,竟达二十种、一百五六十卷之多,这对任何人来讲,都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,何况都是些古奥幽深的学术著作。我们且来看看书名:《四书题商》《雅量编》《淪醒集》《字学刊误》《历朝考略》《家礼考略》《周礼典略》《周易补叶》《释诂》《学绪

私省》《皋邑先贤记》《董解元西厢记评释》《葆朴子杂辑》等等,不要说写,就是读上一遍,估计也很不易。其实范方一生下功夫最深的当属《诗经》,他关于《诗经》的著作有七本:《诗经汇话》《诗经集传闻疑》《诗经类谱》《诗经订注》《诗经六帖重订》《诗经讲意删》《毛诗古解》,真是到了“古人世守一经”的境地。

他研究《诗经》确实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凡是去过“默镜居”的人,见那书桌凳椅之上,必置《诗经》讲义数种,上面写满了手批,像蚊子脚大小的字迹充幅盈几。有人当着范方的面,就说他痴迂。这也怪不得人家,事实就是这样,仅一本《诗经集传闻疑》就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。他在书的后跋里这样写道:

右《诗经集传闻疑》计“国风”八卷,“小雅”六卷,“大雅”六卷,“三颂”二卷,通为卷二十有二,为小字约四十余万,为大字约十余万,为序目等约大小字三万有奇,纸千有余叶,为分册十有二。肇始于康熙元年壬寅之春,告成于二十二年癸亥之夏,中间更易寒暑四十有余,约焚过稿纸万余叶,佣书者十数番,笔墨之类无算。

用他自己的话说,直写得是“气体衰耗”。但你说他痴迂,他立马很认真地对你解释:“非痴也,亦非迂也,实有深蒙积感不能释然于胸中故也。”——这难道不是典型书呆子的话!

他为人极好,胸无荆棘,直率坦夷,人称笃行君子,与他打过交道的人,都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与单纯。他太实诚了,举个例子,如皋范氏都说是范仲淹的后代,很多人都以“文正裔孙”而自得。而他,偏偏在一篇《先府君文学范公退庵行述》中写“吾邑范氏相传为文正公裔”。“相传”仅二字,却一下子打破了数百年来悬于自家头顶上那道炫丽的光环。他说范氏的迁皋始祖名叫六五,并非传说中范仲淹的玄孙范公威。他说范氏在张士诚攻破如皋后就无嗣了,只剩下一个女子,后来招赘了一个许姓人为婿,才得以一脉不绝。他在给好友许容的儿子许钧写“墓图跋”时说“吾宗范氏自秉伦公(即十一世范彝,父亲为许安)下亦系出于许,虽为两姓,实出一本”,还强调“许范百世不为婚”。

一句话,范方就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。

再说范家,进入清朝之后更是蒸蒸日上。范方的堂兄范端受知于开国元勋范文程,历任河南仪封县令、东宛郡丞、户部员外郎,封奉政大夫。范方的侄辈,如范大本任中书科中书,范大士任广西梧州知府,范大成任瑞州知府,范大谟任金坛县训导,范大吕任镇江府训导。仅他堂弟范立这一支,地方志书上说“子孙群从纒青紫者十九人”。完全可以说,范家对大清是充满感激的,《如皋县志》上那一行行“范氏捐赈”的记载说明了一切。谁要是说,范方对朝廷怀有私愤怨恨、有什么不满,打死我都不信。

崇川往事

南通最早的产业
——盐业

□程太和

在数千年“沧海桑田”的成陆过程中,长江三角洲北翼江海交汇之处,生成了广阔的滩涂和茂盛的草荡,为“煮海水为盐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。盐业成为南通地区最早的产业。据地方志记载:“通之资于盐利也久矣”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:“彭城以东,东海、吴、广陵……有海盐之烧”。西汉初年,吴王刘濞招募天下“亡命人”在市境海安及如皋的蟠溪地区(时属广陵郡)煮海水为盐。南北朝至唐初,市境南部的胡逗洲、南布洲和东布洲等沙洲上亦有“流人”以煮盐为业。

唐开元年间(731~741),为检校盐产、征收盐税,朝廷在胡逗洲一带设置税务机构,是为市境南部地区设官之始。中唐以后,盐铁使第五琦、刘晏先后致力于发展淮南盐业,所立盐号为“吴盐”。晚唐太和五年(831),析海陵县东境5乡置如皋场,为市境内最早单独设置的盐政管理机构。五代至北宋初,市境盐区广设盐场,分置官吏。宋初于通州创设利丰监,管理市境南部各场盐务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:“利丰监,古之煎盐之所也,国朝(指宋朝)升为监,在通州城南三里,管八场。四至:东至大海一百八十里,西至泰州界陈墮港四十五里,南至大江口一十里,北至通州三里。八场:西亭、利丰、永兴、丰利、石港、利和、金沙、余庆”。北宋时,朝廷因受外患困扰,决定以盐利接济边防军饷,更注重发展通州、如皋等地的盐业生产,盐业产量大增。通州、如皋产盐主要销往江、浙、荆、湖、淮等路的州、县。南宋时,对盐课尤所注重,是时市境有催煎场10处、买纳场4处,极一时之盛。

元代,市境盐业生产继续发展,有煎盐场12处,盐区总面积达300余万亩。明代,仿“折中法”而行“开中法”,以盐课供应沿边军需。明初于两淮运盐使司(驻扬州)之下创设通、泰、淮3分司,以通州分司(正德十五年(1520)以后长驻石港场)领“上十场”(上十场为:吕四、余东、余中、余西、金沙、西亭、石港、马塘、掘港、丰利、栟茶、角斜2场归属泰州分司)。至明代中叶,通州分司所领“上十场”的年产量达到12万吨左右,为市境古代盐产量的最高纪录。明廷为监察盐课,考核盐吏,每年派巡盐御史按临两淮,初以通州石港为驻节地,前后凡有百余年,明代中叶始移扬州府城。明嘉靖年间,通州、如皋屡遭倭患,市境各盐场成为海防要地。余西场盐民曹顶英勇抗倭,壮烈牺牲,成为通州人民世代景仰的民族英雄。邱陞、刘景韶在如皋北乡西场抗倭,歼倭寇1500余人,取得西场大捷。明末清初,盐业生产因战乱而遭破坏,直至清代中叶才得以恢复。其后因海势东移,产量渐减。清同治年间,吕四、余东、余西等场所产盐以色白味咸备受推崇,列为淮盐之冠。

清末民初,张謇创立同仁泰盐业公司,采用雇佣劳动方式组织盐业生产,并聘请日本工师改进制盐工艺。公司所产精制盐获意大利万国博览会优等奖牌,为中国盐荣获国际大奖之始。其后,又引进松江的板晒制盐法,为小籽盐生产注入活力。民国元年(1912),张謇任两淮盐政,归并旧有盐场,并在各场掀起“废灶兴垦”运动,创设通属总场总辖各场盐务。同年,裁金沙、石港两场;余西场归并余东场,改名余中场;丰利场归并掘港场,改名丰掘场;栟茶场归并角斜场,改名栟角场;吕四场未变。裁并后市境内仅有4个盐场,即:余中场、丰掘场、栟角场、吕四场。民国20年(1931),栟角场归并丰掘场,仍名丰掘场;吕四场归并余中场,仍名余中场。至此,市境内仅存两个盐场:丰掘场、余中场。民国29年(1940),新四军东进,盐区成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,盐务干部在中共淮南盐务管理局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,坚持就地斗争,组织发展盐业生产,征收盐税支持革命斗争事业。